

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生成逻辑的 三维探赜

张新平 魏开宏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理想信念有着鲜明独特的理论、实践与文化方面的生成逻辑:理论逻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实践逻辑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对民族复兴的不懈探索,文化逻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反映,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国际与国内的相互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3)2-0047-08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取得各个历史时期伟大胜利的关键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2]从理论、实践与文化3个维度对党的理想信念生成逻辑进行学理性探究,对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增强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针对性实效性,进而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理论之维:党的理想信念发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产主义观、建党学说以及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理想信念提供了思想引领与理论源泉。

(一)党的理想信念思想内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观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无产阶级以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为特征的运动称为共产主义,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并深刻批判了反动的、保守的、空想的等各种形形色色非科学的社会主义^[4]。共产主义将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等弊端,从而建立一个生产力更先进、物

张新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21年教育部思政专项重大攻关项目“新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1JDSZKZ09)阶段成果

质财富更丰富、人的发展更自由全面的理想社会。同时,共产主义是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有机统一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预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图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物脱离了相互羁绊,国家和阶级消亡,个人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个人与社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实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时取名为“共产党”,就是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并将消灭资产阶级、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政治纲领。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称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还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劳动是衡量权利平等的尺度^{[5]363-364}。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低级阶段”(或社会主义阶段),并进一步阐述其内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整个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国家还未完全消亡,社会还未实现物质财富完全公平,“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6]95}。只有从低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人类社会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巨大飞跃。同时,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社会秩序,往往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工人物质生活条件,其积极因素还未消失殆尽,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缓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步伐。因此,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党的理想信念实践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理想信念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现象,是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共同指向人的精神信仰。中国共产党作为其理想信念的实践主体,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创建的。

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理想社会的坚强政治保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纲领、特点、策略等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11}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尽管在口头上宣称为市民的自由、民主和根本利益服务,然而在实践中却不自觉地沦为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除了维护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同时,共产党又是具有远大理想信念的先进政党,比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更坚定、思想上更先进、行动上更坚决、纪律上更严明,它将领导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使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直至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

在俄国革命中,列宁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他认为,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革命,一方面,需要以先进的理论作为思想引领,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组织领导才能实现,“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7]312}具体而言,无产阶级政党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政治组织,才能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另一方面,党领导的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党报党刊等群团组织既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时也是建设理想社会的得力助手。以工会为例,工会既是联系党员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又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实践证明,这些无产阶级群团组织在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党的理想信念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对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内在精神动力和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奋斗的外在群众动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中国共产党践

行理想信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和深入考察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发挥过的革命作用,其作用具体体现在改进生产工具,开拓世界市场,推动市民社会的形成,消除封建社会陈旧的、僵化的、宗法的、等级的关系,将人从对自然的依赖当中解放出来等积极方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405};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一经产生便在体内孕育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种子,因而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这种与生俱来的矛盾性导致一个结局: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将个人英雄主义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错误观点。旧唯物主义在提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是极少数人(天才、伟人、英雄领袖等)的精神动力之后就停滞不前了,旧唯物主义只看到动力的表象,而没有进一步挖掘动力背后的终极动因。基于此,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深刻阐述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力:“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8]255-256}。中国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先进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始终站在人民至上的立场,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斗争。因此,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的坚强外在动力。

二、实践之维:党的理想信念积淀于中国先进分子对民族复兴的不懈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深深植根于中华大

地,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对民族复兴的不懈探索紧密联系。从走西方道路、走俄国道路,到走自己道路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由此经历了一个从孕育到确立、从模糊到清晰、从抽象到具体、从异国到本土、从借鉴到创新的嬗变历程。

(一)走西方道路的理想探索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中逐渐衰落,成为西方列强蚕食和蹂躏的对象。中国人民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切认识到中西方存在的巨大反差,其民族意识也在无数次磨难和牺牲中逐渐觉醒,不同阶层民众将目光转向西方,由此经历了走西方道路的艰辛探索历程。

太平天国运动是以改造西方宗教构建封建农民阶级的理想实践。太平天国是农民领袖洪秀全根据斗争需要将基督教教义进行利用和改造,而试图创立的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其核心思想集中反映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务使天下人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9]161}太平天国宣扬的“均富贵”“等贵贱”思想,带有朴素的共产主义色彩,它满足了劳动人民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和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因此得到广大底层民众的一致拥护。但《天朝田亩制度》存在先天致命缺陷:它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仍然以落后的小农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基础。再者,它是一个没有先进思想指导的松散组织,各大“天王”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又做起封建土皇帝的美梦,难免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伏笔。

戊戌维新运动是以效仿西方宪政实施君主立宪的理想实践。19世纪末,一部分接受过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刻体会到,要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需要进一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腐朽的体制机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提出变革、改制、倡导西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主张,这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维持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带来一定冲击。然而,“戊戌变法”运动仅仅维持了103天便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保守派残酷镇压而失

败。究其原因,维新运动将变革社会的理想寄托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贤明君主身上,没有找到真正推动社会变革的阶级和力量。因此,其夭折的命运不可避免。

辛亥革命是以革命手段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实践。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0][24]}的政治纲领,试图用革命的手段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被推翻。显然,它的历史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是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11]孙中山始终坚定“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虽经历屡次失败仍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和意志对久经磨难的中国民众产生了巨大的警醒与激励作用。但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未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因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终究无法完成拯救中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纵观近代历史,惨痛的失败和血的教训表明:没有科学的思想指导,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走西方道路、在中国建立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实践犹如海市蜃楼、镜花水月一般终将幻灭。中国先进分子需要继续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求新的出路。

(二)走俄国道路的理想探索实践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给黑暗中苦苦探索革命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带来曙光和希望,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理想信念确立的现实基础。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随着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著在这一时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启示。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潮流。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极

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众的觉醒,“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12][20]}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掩盖下联合压迫中国的卑鄙行径。同时,学生、工人、市民在五四运动中爆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13],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将探寻救国真理的方向逐渐转向带有鲜明革命特点的社会主义。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宣传、号召和组织下,许多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历史性地选择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俄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标志着科学理想信念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14][357]}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苏共建党实践给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基本遵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党的成立,并确立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理想。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研究,因此这一时期党的理想信念还比较模糊、抽象,对于“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不可能认识清楚。”^{[12][35]}

苏联模式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深远影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影响深远,也从正反两方面形塑了党的理想信念。就积极因素而言,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的过渡时期曾面临国际国内敌对势力侵扰、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等多重困难,列宁领导俄共(布)先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平定了国内外叛乱,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通过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连续多次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赢得苏联卫国战争的重大胜利,形成了苏联模式。苏共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以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为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有力的思想指导与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消极因素

而言,以王明为代表的部分早期党中央领导人无视中国具体革命实践,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和巨大牺牲,致使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怀疑、动摇,甚至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这也从反面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深刻的镜鉴与启示。

(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探索实践

习近平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5]在经历了走西方道路的失败和汲取走俄国道路的经验教训后,中国共产党既没有走向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不同时期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对理想信念的认识也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砥砺了党的理想信念,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捍卫了民族尊严,增强了人民信念。党的理想信念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经受住磨炼和考验,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理想信念的结晶与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多次对党的理想信念发表重要论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6]225}、“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16]373}、“中国式的现代

化”^{[16]54}、“小康社会”^{[16]161}、“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6]27}等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涵,使党的理想信念更加具体化、明晰化、本土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新时代实践中,党中央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持守正创新,在全社会广泛弘扬党的理想信念。其一,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党的理想信念重要内容,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丰富了理想信念内涵。其二,将理想信念比作政治灵魂、精神之“钙”、精神支柱、顶梁柱、总开关等,形象阐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及重要意义。其三,开展党内学习教育活动,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进一步推动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用远大理想统一全党思想意志,用共同理想凝心聚力,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自信。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对各种不同道路的探索历史,就是一部党的理想信念孕育史、生成史、发展史、创新史,其中蕴含着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变化之处在于:党的理想信念在形态上从孕育变为确立,在表述上从模糊变为清晰,在内涵上从抽象变为具体,在传承上从异国变为本土,在形式上从借鉴变为创新。不变之处在于:纵观近代以来的各种革命理想实践,中国人民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和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变。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风雨历程,其理想信念却历久弥坚、历久弥新。由此可见,变化的是形式与过程,不变的是内核与根本。

三、文化之维:党的理想信念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悠久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带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质、中国精神,

并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思想文化精髓。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为历朝历代无数理想主义者提供丰厚的精神养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生成的文化源泉。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观

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有关理想、信念的论述非常丰富。不论是指代理想的“志”，还是表示信念的“气”“诚”“恒”等，相关论述都在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锤炼道德品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理想即“志”。理想一词是个舶来品，“系从日语中借来，用以翻译西方的 idea 一词。通常指一种关于未来奋斗目标的想象”^[18]。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理想一词通常用“志”表示，如“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诗言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等。《论语·先进》记载了一段关于孔子和弟子讨论理想的经典对白。孔子问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弟子的理想，弟子各言其志。当曾皙谈及自己的志向时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9]¹⁰⁴。孔子听完后大加赞同，喟然长叹曰：“吾与点也。”由此可见，孔子对弟子诗书礼乐与歌舞人生的理想观点表示认同。孟子则从个人理想产生的角度作不同的阐释。《孟子·告子下》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0]²²³。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受多重考验，心身的磨炼（心志受挫、筋骨劳累、身体饥饿、行动受阻）是一个即将接受“上天”重大使命之人的必经之路。如此，个人才能改变思想、坚定意志、担当重任。孔子和孟子的论述实质上揭示了理想与实现之间的巨大内在张力：理想是美好的，但实现理想的过程却异常艰难。因此，有志之士既要志存高远，又要笃行不怠。

信念是“气”“诚”“恒”的统一体。“信念”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可用多种语义相近的概念表述：其一，信念即“气”。孟子认为，信念由“浩然之气”聚合而成：“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

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20]⁴⁷。孟子所言浩然之气，极其浩大刚毅，充斥于天地万物之间。这种信念需要个体用正直来滋养，与道义相匹配，否则就会因缺乏精神力量支撑而显得英雄气短。其二，信念即“诚”。《说文解字》将“信”解释为：“信，诚也”^[21]³⁷⁷。从本义来讲，信就是诚，即诚实守信；从引申义来讲，信念是个体在观察、认识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对某种事物或观念作出坚信不疑的判断，在情感和心理上极度认同，从而在行动上朝着认定的目标执着前行。例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指其意。其三，信念即“恒”。恒指持久。《恒卦·彖传》曰：“恒，久也”^[22]⁴⁴⁵。一个有信念的人往往能持久专注于某事，则最终会实现其理想。综上，在古代文化中，信念集气、诚、恒于一体，共同作用于行动主体。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逐渐积淀而成的。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学派中，具有代表性的儒、释、道三家分别对理想人格作过不同阐释。例如，儒家的君子、大丈夫、圣贤等，佛家的佛陀、如来、觉者、菩萨等，道家的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等，都是不同思想学派建构的理想人格。自汉武帝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思想以来，儒家文化提倡的理想人格自然成为封建社会自上而下普遍接受的主流形态，并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安邦治国特色。同时，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观、实践观、天下观等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文化基因。

其一，理想人格是德才兼备的统一者。古人非常重视修身立德和学业精进，但首先强调要以修身为本，行有余力才可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二，理想人格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言：“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谓之圣人”^[23]³⁰⁴。理想人格能够在思想上领悟“道”、在行动中体现“道”，这种既聪明又贤达的人便可称为圣人。其三，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实践者。理想人格不但注重自我修养，还心系天下苍生、关怀人间冷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无不体现儒家理想人格的天下情怀与人文观照。这些思想

观点无疑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培养发挥了思想启示作用。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生观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理想人生可由低到高概括为感性、理性、信仰3个层级,由此构成“小我”“大我”“无我”3种不同人生境界,呈现为金字塔分布模式。

其一,感性层面——“小我”的人生境界。这一层次的理想人生具体表征为“学而优则仕”^{[18]104},即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提升自身修养,进而实现政治理想。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小我”的理想人生,以追求个人政治利益与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最终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功名)和物质利益(利禄)双赢。因此,感性层面的理想人生处于金字塔的最低端,通常体量庞大但层次不高,是封建社会大多数文人士子追求的理想境界。

其二,理性层面——“大我”的人生境界。这一层次的理想人生具体表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论述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修行自我、经营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人生追求从感性层面提升到理性层面,进入更高层次,将个人理想与家庭、国家、天下有机结合起来。因此,人生境界也实现由“小我”至“大我”的飞跃,丰富了个人理想的内涵,也提升了理想人生的价值。

其三,信仰层面——“无我”的人生境界。这一层次的理想人生具体表征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4]320}。这是从理性层面上升至信仰层面更高层级的理想人生,同时也是从“大我”飞跃至“无我”的最高人生境界。从时间角度看,不论感性层面或理性层面的理想人生,都着眼于当下,而信仰层面则从当下延伸至千秋“万世”,充分体现了“无我”的特征。从空间角度看,信仰层级的理想人生关注的领域更广泛:一方面,突破此前的家庭、国家、天下等空

间界限,拓展到广袤的宇宙,在天地之间传递博爱济众的仁爱之心;另一方面,观照的对象继承并超越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从此前的天下百姓扩展到芸芸众生,帮助世间一切生民安身立命。信仰层面因时间的永久性与空间的无限性而处于金字塔顶端,也是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到达,因此也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灯塔与坐标,激励着一代代理想主义者为之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弘扬了信仰层面的“无我”理想人生观。革命时期的伟大牺牲精神,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5]144}的执政理念,均是中国共产党人“无我”理想人生观的生动体现。

(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

春秋战国时期以来,新的生产力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撬动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各路诸侯纷纷争霸,推翻了旧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促进了各民族融合,由此也推动社会形态更新迭代。战争成为先秦时期典型的叙事特征,接连不断的战乱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创伤。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在反思社会动荡和批判黑暗现实的同时,也对理想社会进行前瞻性勾画,儒家的“大同世界”、法家的“法治社会”、墨家的“兼爱社会”、道家的“至德之世”等等,都是先秦诸子试图建构的理想社会。其中,儒家描绘的“大同世界”就是理想社会的典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26]154}。这将是一个讲求公平正义、选贤任能的社会,一个讲求诚信友爱、团结互助的社会,一个讲求共同富裕、夜不闭户的社会。它生动反映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崇尚和睦友爱,维护公平正义,讲究道德秩序的理想社会观。

由此可见,这里的“大同”世界表达了古代先哲对理想世界的美好憧憬,带有朴素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理想社会的文化之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为世界谋大

同”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理想社会观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具体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生成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历程中,将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共同构成党的理想信念丰富内核,并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进一步继承创新、发扬光大,为实现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坚强的思想基础和磅礴的精神动力。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反映,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国际与国内的相互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涵养初心使命,方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行稳致远,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 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N].人民日报,2021-09-02.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第1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孙中山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 [11]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10-10.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
- [13]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
- [1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05-29.
- [18] 刘建军.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几点理论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4,(11).
- [19] 论语[M].杨伯峻,杨逢彬,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
- [20] 孟子[M].杨伯峻,杨逢彬,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
- [21] 古敬恒,刘利.新编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
- [22] 刘先枚.《周易》经传注译解[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23] 贾谊.新书校注[M].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4]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6] 陈戍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责任编辑 陈广亮]